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Zhen Zeng

School of English and Education, Chengdu Institut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844, China

Abstract

As a relatively common form of literary existenc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research, and has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utual exchange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existence of this literature from the definition, status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especially to provide some opinions and basis for the staff engaged in bilingual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literature; definition; status; role

浅析翻译文学

曾真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英语教育学院, 中国·四川成都 611844

摘要

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文学存在形式, 翻译文学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尝试从翻译文学的界定, 地位与作用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文学存在方式, 特别是为从事双语翻译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看法和依据。

关键词

翻译文学; 界定; 地位; 作用

1 翻译文学的界定

1.1 翻译文学的兴起及界定

中国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自翻译佛经开始。中国的佛经翻译,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至迟在东汉恒帝建和二年(14年)已有译经。第一部汉译佛典是《明度五十较计经》。汉唐两代著名的佛经译者有支谦、道安(314-385)、鸠摩罗什、玄奘(600-664)等。

第二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 共计翻译西书437种。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近代。本期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翻译主体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翻译主体多是西域高僧或取经归来的中国僧人, 第二个时期的翻译主体是耶稣会传教士, 那么第三个时期的翻译主体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生这种变化的主因就是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 and 派遣留学生这两大举措。第二个特点它是脱离了合作的翻译方式而走向独立翻译。第三, 与前两个翻译时期相比, 近代翻译时

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翻译。从19世纪70年代起, 就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诗歌和小说, 甲午战争后, 翻译文学逐渐繁荣。^[1]

中国翻译文学的界定是: 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 翻译文学是整个文学中的一个门类, 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 指译自外文的各种文学作品, 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 促进文学的进步和繁荣起着重要作用。

1.2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异同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并不相同的概念, 常易混为一谈。相同点是二者都与文学及翻译有关, 都涉及原作者与译者; 不同点是二者的定义与性质各异: 文学翻译定性于原作的性质, 即外国(或古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 与之相对照的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 定性于译品的质量、水平与影响。

2 翻译文学与各种文学的关系

2.1 与海外文学的关系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有人问：《高老头》属哪国文学作品？回答很可能是：当然属法国文学作品，因为作者是法国人巴尔扎克。这个例子表明，很多人认为翻译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了。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认识。因为中文本《高老头》的作者是译者傅雷（或别的译者），而并非不懂中文写作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既然译品的作者是中国人，自然也就不能再说是法国文学了。因为这时的中译本《高老头》已经是原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它已经赋予原作以新的艺术生命，使原作以一种新的姿态和新的语言面对新的读者群和另一个新的“文化圈”。这个读者群是只懂中文而不懂法文的读者群，这个新文化圈是一个与原作所在的文化圈相异甚至完全不同的“汉文化圈”，其文化传统、审美趣味和文学欣赏习惯均具有自己固有的特点。当然，翻译文学与海外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说来，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前者是后者的变体，二者均具有独立存在的文学价值。原作与译作不仅在语言文字形式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就是在思想内容、表达方式上，也因为中外语言与文化的固有差异而有所变异。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常常会使译作相对原作而言有所失落、增添、借位、变形。因此，无论怎样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都无法完全等同于原作。据此分析，翻译文学与海外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原作属于海外文学，译作属于翻译文学。说得具体一点，翻译文学作品乃是基于已有作品（即原著）而产生的一种演绎作品，或曰派生作品，是从属于原著而又不同于原著的一种新作品。王向远认为，“翻译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它与我们所习用的“外国文”这一概念具有重合之处，所以长期以来不论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还是专业工作者通常都将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事实上，“翻译文学”不等于、不同于“外国文学”。首先，“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著作人主体有所区别。文学翻译家所翻译的固然是其他国家作家的作品，但文学翻译不同于依靠机器来翻译的简单的语言转换。它必超越语言（技术）的层面而达到文学（审美）的层面，也就必然依赖于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关于这一点，中外的翻译家和研究者都有共同的想法。可以说“翻译文学”是一种“翻译性的创作”（可简称为“译作”）。第二，从文本的角度来看翻译的结果译本，是独立于原作而存

在的。第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一个文本的最终完成，要由读者来实现。而译本的读者群不是原作的读者群。译本的完成要由译本的读者来实现。由于时代、社会、文化、语言等种种因素的不同，译本可能会获得与原本不同的解读和评价。

2.2 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

承认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形式，又如前所述它不再属于海外文学范畴，那么不言而喻，它就应该属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范畴。比如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朱生豪翻译的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都应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不拘一格，但其制作方式无外乎创作、翻译及改编等。其中创作是从无到有，改编大多是原作（这个原作可能是本国作品也可能是海外作品）文学样式的变换，翻译则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变换。无论是改编还是翻译，其最后成果均是与原作面貌相异的文学作品，均具有独立存在的文学价值，都应该得到社会及文学艺术界的承认。其改编者、译者的劳动和地位都应予以充分肯定与尊重。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本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如《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陈子展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王哲甫著）、《中国小说史》（1939，郭箴一著）、《晚清文学史》（1935，阿英著），都曾辟专章专节描述讨论了翻译文学的发展情况及其影响。令人奇怪的是，在此后长达约50年的时间里，“翻译文学”这个名词却几乎销声匿迹了。直到1989年，由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公开出版后，才旗帜鲜明地重申：“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翻译文学是我国绚丽多彩的文学园地里一枝独具芬芳的鲜花。”翌年，即1990年，由施蛰存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的《翻译文学集》（共三卷）由上海书店出版，辑录了1840—1919年间出现的翻译文学作品，是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资料。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该书导言的附记中，仍有这样的话：“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可见翻译文学是否是本民族文学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尚未达成广泛的共识，甚至互持完全对立的观点。如贾植芳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批评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而王树荣先生却撰文质问：“汉译外国作品是‘中国文学’吗？”他对贾植芳先生的提法“总感到有点稀奇：翻译文学怎么也是中国

文学的‘作家作品’呢？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戏剧、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文学’？”之所以存在这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对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以及它是怎样丰富民族文学的文艺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语言，对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何影响与促进作用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所造成的。由于缺乏深入研究及令人信服的例证，人们往往从表面上得出翻译文学即海外文学的结论。直到去年，才有一位学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翻译文学置于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的广阔领域中加以深入研讨，从而使翻译文学本身的性质和独立价值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2.3 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上面所提到的学者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他的研究成果就是1999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译介学》。在中国学术界，译介学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术语，人们往往把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理论与技巧研究混为一谈。实际上，译介学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1]由此可见，翻译文学是译介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而译介学又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如前所述，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混为一谈，把翻译文学与海外文学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异同与联系，很少有人去探究，从而造成很多基本概念上的模糊或错误认识。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他的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是：以大量丰富的实例和一定的理论高度，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定义、作用及归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评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提出了如何编写一部符合实际情况的翻译文学史的主张。此外，他还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独到的见解，认为文学翻译中的错译、失落及扩伸等并非译者的无能与无奈，而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正常

的现象，正是译者根据不同文化的差异而做出的创造性叛逆，得以使原作新生，在与原作不同的另一个文化圈中广泛流传。作者的这些重要论述与论断，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3 翻译文学的地位与作用

五四时期郭沫若曾经有过一种比喻，把创作比作“处女”，而把翻译比作“媒婆”，为此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发生过一场争论。姑且不论那场争论中的义气成分和有意无意的误读，如何看待翻译文学，的确是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中，翻译文学常常受到冷落，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种专门的翻译文学史、比较文学史之外，绝大多数文学史著述对翻译文学视而不见，或者只是作为背景来看待。而实际上，对于现代精神启蒙，对于作家的养成、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文体范型与创作方法创作技巧的示范引导、现代文学语言的成熟，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翻译文学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译文学不仅仅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而且从对象的选择到翻译的完成及成果的发表，从巨大的文学市场占有率到对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都作为走上前台的重要角色，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构建和民族审美心理风尚的发展，对此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也尤为深远，最为明显的是文体，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这四大文体都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深刻的影响则是对语言的影响，从而最深层的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在语言上不仅仅只是表现在表达的丰富、新颖、语言风格变化上，而最根本的则是从深层的角度对思想和思维的影响。近代翻译文学确立了中国学习西方文学的基本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通过翻译西方文学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除此之外，翻译文学还为跨文化系统研究提供了最理想的研究园地。

参考文献

- [1] 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概论 [M]. 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2]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